

壹、前言

十七世紀臺灣西海岸自八掌溪以南因受沙汕的影響而形成若干個內海，其間最大的內海位在臺南，就叫做「臺江」。其臨外海有一細長的沙洲，沙洲中處處都有潮汐口，這些潮汐口因為受到潮流及風浪的影響，漂沙移徙非常發達，致時塞時開，位置不定，因此各沙汕的面積和幅度的寬窄、長短以及各沙汕間的距離和方位，變異既速又大。而潮汐口經潮流和風浪衝擊的結果，漂沙一旦流開，即自然濬深成為船舶進出的良好港口，若其內海裡適有較深的碇泊處所則成為良港。既有了良港，則其附近就會形成港埠，或成為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塞之基地。反之，則良港亦可能為之淤淺閉塞，潮汐口也會因聚沙而形成陸地相連的沙洲，則原有的港口就會消失。所以，十七、十八世紀臺灣西部沿海港口經常變動，鹿耳門就是一典型的例子。

據明萬曆三十年十二月（一六三三年元月）隨沈有容剿倭來臺的陳第所撰《東番記》云：「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魷港、加老灣，歷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皆其居也。」⁽¹⁾可見當時還沒有「鹿耳門」港口，至少也還不是重要港口，故沒有加以記載。但是，荷蘭人據臺後所繪製的海圖和地圖，便開始繪記其位置及名稱，顯示當時已有船隻進出這條水道了；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更利用這條水道進入臺江而光復臺灣。大約在鄭成功進入臺灣後不久，鹿耳門港口因受潮流濬深成為良好的港口，同時期在安平島的大員港卻因漂沙淤塞，遂使鹿耳門港變成入臺第一港口，且成為府城的咽喉要塞，兵家必爭的重地。從此，府城的軍事、經濟、政治、交通都以此為屏障。

入清以後，因受積沙的影響，臺南一帶的海岸線逐漸向西延伸，海岸一帶的地殼也逐漸隆起。最嚴重的是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曾文溪洪水泛濫，臺江內海受到大量泥沙之淤填浮成陸埔，鹿耳門終於失去了港灣的機能，也失去了它的天險，從此成為廢港；郡城附近的臺南也因為失去了重要屏障的依靠，而逐漸失去臺灣首邑的地位。

有關鹿耳門的研究，前人確有相當多的論述，其中較重要的有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的《臺南文化》第七卷第三期之「鹿耳門專輯」，由黃典權、許丙丁、高崇熙、賴建銘、林鶴亭、韓石爐、江家錦、郭水潭、朱鋒、王呈祥等執筆，就鹿耳門的名稱、遺址、港口位置與變遷等分別加以考證，內容非常精彩；專書則有盧嘉興的《鹿耳門地理演變

考》，對於鹿耳門的研究貢獻很大。這些論著對本文的研究也提供相當的助益，但觀其內容，大多偏重於鹿耳門的地理演變及考證古鹿耳門的真正位置，對於這一海門天險的海防設施？臺的建置及其演變，則乏人做深入的探討。事實上，從一座？臺的創建、擴建與改建，或遷建，或廢棄，亦可觀察出？臺所在地之地理變遷及其地位之變化與影響，本文即意欲嘗試從荷據時期繪製的地圖、清代的輿圖及相關的文獻史料來分析鹿耳門何以成為臺郡第一天險？並且從鹿耳門？臺的創建、改建、擴建與廢棄等演變來觀察它與臺郡的互動關係。

？、鹿耳門？臺建置始末

一、荷據時期的鹿耳門：一個大的潮汐口

臺灣最早的府志：蔣毓英的《臺灣府志》稱「鹿耳門，形如鹿耳」⁽²⁾，可見是以形貌取名，而觀之輿圖所繪，確有幾分類似鹿耳。這處因鄭成功率師復臺由此進入臺江而名垂青史的港道，在十七世紀剛開始（即明萬曆三十年）的時候，中國的志書尚無它的記載。但是，荷據時期荷蘭人所繪製的海圖和地圖，已開始有「鹿耳門」的記載；因此，要瞭解鹿耳門的形成，就必須仰賴荷蘭人所繪製的地圖。

十七世紀的西歐人能順利來到東亞拓展貿易，擴展其殖民地，發達的航海技術是最大的因素，而航海須賴詳實精確的海圖。因此，西歐對於海上測量要求特別精細，所以荷蘭人要從澎湖撤遷到大員（即今安平）時，就曾經實測繪製由澎湖至大員等地的海圖，佔據大員之後，更測繪附近若干的地圖。這些海圖與地圖也就提供了研究「鹿耳門」最原始及最具價值的史料。

據荷蘭國立海牙檔案收藏西元一六二四至二五年間舵手 Heyndrick Ariensen 所測繪之 大員等地之海圖⁽³⁾，圖中繪明北線尾及大員島，但並沒有「鹿耳門」的標示；而 Heyndrick Ariensen 同時測繪的另一幅 澎湖至大員島、港、堯港等地之海圖⁽⁴⁾中，則雖然已記有「普羅民遮街」、「城堡」、「大員」、「黑砂丘」、「魷港」、「堯港」等，但仍沒有標示「鹿耳門」，據此可知，當時還沒有這一港道。

但是，到了大約西元一六四 至五 年間就有了顯著的變化。根據這個期間荷蘭人所測繪的一幅 Zeelandia 市等地之海圖⁽⁵⁾，荷人已經在北線尾島的中部稍稍偏南的地

方繪一堡壘，標明 Reduit Zeeburigh（方形海堡），又在島之北端，標示 Lacjemue（鹿耳門），據圖可見到北線尾島的北方有一非常發達的沙洲暗礁，與北線尾島間形成一條水道，標示著 Tgat van Lacjemue（鹿耳門溝口或峽口），這是文獻史料上最早有關「鹿耳門」的記載。雖然鹿耳門溝是當時比較少用的水道，但是中國人已經在這條水道南邊的岸上建立了一處小漁村，這表示此地的重要性已逐漸地提高。不過，由於來到臺灣與荷蘭人通商貿易的中國船或日本船，大多由北港道與南港道這兩條水道出入，且當時的鹿耳門港道尚淺，沙汕重疊，大船進出相當困難危險，所以這條水道並沒有引起荷蘭當局太多的重視，也不甚防備，以至於讓鄭成功有機可乘，由此進入並登陸北線尾島。

二、鄭氏時期的鹿耳門 「鹿耳門? 臺」建置之濫觴

鹿耳門因鄭成功的登陸而名耀青史。「鹿耳門」也由最早的北線尾島北方港道之名延伸為村名，含義擴大，到了後來更替代北線尾而成為島嶼的全稱。

考荷蘭末期鄭成功入臺之際，鹿耳門港道僅能通行小船，大船無法出入。據楊英《從征實錄》稱：

（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黎明，藩坐駕船即至臺灣外沙線，各船魚貫絡繹亦至。辰時天亮，即到鹿耳門線外。本藩隨下小哨，繇（由）鹿耳門先登岸，踏勘營地。午後，大船齊進鹿耳門。先時此港頗淺，大船俱無出入，是日水漲數尺，我舟極大者亦無，天意默助也。⁽⁶⁾

又據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卷二云：

（永曆十五年）四月初一日天明，賜姓至臺灣外沙線，各船絡繹俱至鹿耳門線外。此港甚淺，沙壇重疊，大船從無出入，故夷人不甚防備。是日水漲丈餘，賜姓下小船，由鹿耳門登岸。午後大舢船齊進，泊水寨港，登岸紮營。⁽⁷⁾

可見當時的鹿耳門確實沙汕太多、港道太淺而不利大船航行。

鄭氏治臺後，鹿耳門港道的情況如何？據 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⁹⁾（以下簡稱軍備圖）之「山川險要水路島嶼」項，對於當時的「鹿耳門」有如此的記述：

入鹿耳門由此港進，此港原只有柒尺深，至偽藩過臺灣之時，其港底之沙流開則有壹丈柒尺深。

其所記指出鹿耳門港道跟鄭成功入臺時並無顯著變化，依舊「柒尺深」。不過，文中指出鄭成功率軍入鹿耳門港時，港道並非潮水特別高漲，而是因為流沙受潮流沖開澆深的

關係，此種說法是否正確值得重視。

跟鹿耳門有密切關聯的港道南岸之北線尾，軍備圖則云：

此地名北線尾，搭草屋數間，設官把守，並盤詰往來船隻，此岸名海翁線，入鹿耳門內自此一條線內可以泊船，線外則大海（臺江內海）一帶可拋泊船千百隻，但北風時，其船甚搖擺，至偽承天府前尚有壹里淺地，若海水大潮則直到偽承天府前。⁽¹⁰⁾

另在「圖記」上繪有一座「小砲臺」在北線尾上。⁽¹¹⁾

根據這張軍備圖來研判，可以看出下列的若干狀況：

- (一) 鄭氏領臺後，北線尾島北端已逐漸向北延伸，南端則逐漸沉沒。
- (二) 鹿耳門港道南岸新淤積的土地已較原北線尾沙汕為高，因此才得以搭建草屋數間。而北鹿耳門港道雖因海底流沙變化而時深時淺，但普通船隻已多由此港道進出，所以才要設官把守並監視盤詰往來的船隻。
- (三) 臺江東岸靠臺灣本島的海岸線已逐漸向西延伸，因此，在鄭氏據臺後不久，赤崁樓（即承天府）已離海岸有一里之遠。
- (四) 鹿耳門已替代漸被流沙淤積的大員港，⁽¹²⁾而成為明鄭的咽喉，所以鄭氏必須在港道南岸的北線尾之北端設置「？臺」以為把關；而這座？臺，無疑的就是「鹿耳門？臺」建置的濫觴。

三、清代的鹿耳門？臺

(一)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以前的鹿耳門？臺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從此海峽兩岸暢通無阻，臺灣的墾拓自然更為方便和發達，一波波的移墾民，一艘艘的船隻，往來於大陸與臺灣之間。在這當中，臺灣府城因行政、經貿、港道的緣故而最為重要；但是過去眾船停泊的安平大港，卻因沙汕積聚的結果，港道變得既淺又狹窄，大船已無法進出，變成小船停泊的地方，⁽¹³⁾鹿耳門便取代了大港的地位與功能，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之十 扼塞 項就很清楚地指了出來，書云：

當大津之衢，而扼其吭者，鹿耳門是矣。⁽¹⁴⁾

於是清廷承襲明鄭置兵扼守之舊制，設「鹿耳門汛」，置把總一員，兵四十名。⁽¹⁵⁾

到了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鹿耳門的重要性更上一層樓，成為臺灣之

咽喉。高拱乾纂《臺灣府志》，海道 條云：

今之往來船隻，必以澎湖為關津，從西嶼頭入，或寄泊峙內、或媽宮（二者北風寄泊最穩處）或八罩、或鎮海嶼（二者南風寄泊最穩處），然後渡東吉洋（即甘吉），凡四更，船至臺灣，入鹿耳門，則澎湖乃臺灣之門戶，而鹿耳門又臺灣之咽喉也。⁽¹⁶⁾

再據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來臺辦理採硫的郁永和所撰的《裨海紀遊》記：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晨起 望鹿耳門，是兩岸沙角環合處；門廣里許，視之無甚奇險，門內轉大。有鎮道海防盤詰出入，舟人下楫候驗。 蓋鹿耳門內浩瀚之勢，不異大海；其下實皆淺沙，若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線，而又左右盤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輕入，所以稱險。⁽¹⁷⁾

綜上所記，可以瞭解鹿耳門港口何以稱險及其形勢之重要。因此，除設有「鹿耳門汛」之外，在鹿耳門口駐有「鎮道海防」的人員來檢驗進出的人。

除了檢稽進出的船隻及人員外，為了鞏固海防，維護府城的安全，鎮嚇不法之徒，清廷也選擇在鹿耳門港口架設墩臺。據高拱乾《臺灣府志》卷四 武備志 水陸營制 及 墩臺 條記：

一、輪防鹿耳門汛（係報部三營官兵按月輪防）：千總一員、步戰守兵二百名，戰船二隻， 墩臺，一在安平鎮鹿耳門港口。⁽¹⁸⁾

以此墩臺來扼制港口發揮咽喉鎖鑰的作用。

清初的這種墩臺，其形制仍襲明代的方式，係以黃土堆砌再以磚包砌而成，如多石塊的地區則也有用石塊壘砌而成者；其形制和規格尺寸大小，則視其建造的位置之高低而有不同。通常的形狀是下面大、頂面小的方形臺體，一般高度為九點二公尺，臺的長度為而十二點三公尺，寬度為十點五公尺。⁽¹⁹⁾明代的衛、所城寨之間，為了防守、警戒、聯絡和報警，沿海依地形普遍築有這種墩臺，進入清代則仍然沿用，在臺上安置紅衣炮等各式大小銅鑄炮。

鹿耳門雖然是臺灣之咽喉，但清廷並未立即建造？臺，一如上述只架設墩臺這類較為簡易的工事。這種狀況直到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才改變，於墩臺之外創建新？臺二座。

據《臺灣縣志》卷四 武備志 墩臺 條記：

鹿耳門：？臺二座（康熙五十六年奉文築造，安？十位。水師三營輪撥千總一員，帶兵防守），墩臺三座，望高樓一座。⁽²⁰⁾

在這處海邊的口門上，建造兩座？臺，安放十門大？，還置有墩臺三座，望高樓一座，並且撥千總一員帶兵防守。這樣的配備與設計，放眼清初臺灣的諸？臺，無疑地是最具規模了。這樣的規模我們也可以從完成於康熙五十九年的《臺灣縣志》輿圖中所繪的「鹿耳門？臺」看出這個重要性與氣勢來。

又，鹿耳門？臺何以認定創建於康熙五十六年的這一次建造？如果我們觀察並比較這一次在臺灣縣所建的十六處？臺，就可以發現新建的？臺如鹿耳門、柴頭港海口、鯤身蟻港汛、鯤身頭汛等四地，都僅註明「康熙五十六年奉文築造」，但如果是重新建築的，如澎湖的新城東港口、挽門澳、水坡澳、將軍澳等？臺，便都一律註明「原有基址；康熙五十六年奉文重修」；這裡的「原有基址」與「奉文重修」正好提供了「鹿耳門？臺」是「創建」於康熙五十六年的佐證。

另外，清廷何以在將臺灣納入版圖三十三年之後，才改善鹿耳門的設施，安置？臺？這與當時的鹿耳門港口之變化以及往來府城之交通、軍事的重要性息息相關。

康熙末年的鹿耳門港口相當狹窄，「僅容三舟」且「左右皆沙石淺淤」⁽²¹⁾，而港內則是水師戰船、商民舟楫止宿之地。因此，敵人一旦入港，安平必失，安平一失則港內舟楫出海之路被斷，敵人即可據安平而抗府治並號令南北二路絕依附之門，是故敵一入鹿耳門，那麼臺灣的防務就危險了。這種形勢已被巡臺的黃叔璥看了出來，所以，他稱鹿耳門是「臺灣的內門戶」，更是「用武必爭之地」，認為「觀臺灣之形勢，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為最急」。⁽²²⁾就因為是臺灣的內門戶、郡治的咽喉、用武必爭之地，因此才得以擁有？臺兩座、大？十門、守兵三百名等重裝備。

但是，這一規模不小的？臺，竟毀於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的戰役。據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四 軍志 軍官 「林亮」條：

林亮，字漢侯，福建漳浦人也。康熙辛丑夏，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竊據全臺，水師提督施世驃以亮膽識超群，忠勇出眾，委為前隊先鋒，領舟師五百七十人，自澎湖進發。六月十有六日黎明，大師咸抵

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據鹿耳門砲臺，發大砲以拒我師，百千奔雷，飛轟海面。亮奮勇爭先，以六艦冒死直進，盡銳攻擊；遙望砲臺火藥桶堆積如山，命施巨砲，專攻其火藥桶，中之，火起，烈焰沖天，燔斃賊不可計數。賊眾大敗。奪取鹿耳門砲臺，焚賊營壘，乘勝進攻安平鎮。⁽²³⁾

據此可知，這座創建於康熙五十六年的鹿耳門砲臺，於六十年四月朱一貴之變時為朱將蘇天威所據，同年六月施世驃命林亮進擊，以巨砲擊中砲臺的火藥桶並引起大火。因此，一直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才由林亮這位當年奪回砲臺的英雄加以重修，並新增若干裝備與設施。

林亮重修鹿耳門砲臺後安置的大砲與裝備，非常難得地保留在史料裡。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二 赤崁筆談 武備 條記：

鹿耳門砲臺，今圯。砲十五位，中、左、右三營各五位；以木架之，中有一樞，隨向轉動，名曰轉輪。雍正甲辰，總兵林亮新修砲架，上橫梁前後各長四尺，中實三尺，下橫梁前後各長五尺，中實三尺，上下直梁各長四尺，梁柱各五寸，四方直柱各高四尺，接筍處俱裹以鐵，下坐板厚三寸、橫八尺、闊七尺，柱腳木九根，圍一尺八寸、長五尺、入地四尺五寸。蓋以木為之，如屋頂式，可以避風雨剝蝕；兩邊用環勾牽，然時掀下極易。⁽²⁴⁾

顯然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林亮所新修的鹿耳門砲臺已經沒有厚重的「臺」這一建築結構，而改用上述以木架砲的「砲架」架上十五門「轉輪」。

林亮為何不按原型重建砲臺而改用砲架？這跟當時鹿耳門的地質有直接的關係。砲臺所在舊稱北線尾的土壤是以長期沉積的自然沙質為主，再經過地質演變而形成的沙汕陸埔，這種地質潮濕鬆軟，不利於構築粗重的砲臺，林亮當時已看出這個缺陷，才改良了這種可以在沙土上運作的木質「砲架」，以取代傳統的砲臺。

這種不築砲臺而以砲架取代的做法，不久之後，也應用在同質性的安平。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閩浙總督郝玉麟就是因為「安平地方，潮水易長，土鬆難築砲臺」而奏准「倣照鹿耳門之式，設立砲架七座，以資捍衛」⁽²⁵⁾。可見以木質砲架架砲是清雍正年間用來適應或克服臺江內外的沙汕或海埔新生地土質鬆軟的一種有效而務實的方法。

因為鹿耳門形勢險要，又是防守入臺的要地，清廷乃於雍正八年（一七三

年)將海防廳移駐該處，用以稽查入出人船。⁽²⁶⁾

鹿耳門這種新制的海防設施，自雍正二年迄道光九年（一七二四年至一八二九年）的百餘年間，並無多大變化，僅於水師中營鹿耳門汛設有？架八座，水師右營鹿耳門汛則有？架七座⁽²⁷⁾共十五座做為防守鹿耳門而已。推原其故，還是因為鹿耳門口水勢浩漫，南北二汕海上浮沙易於陷沒，無法建造？臺，也無處可設營汛的關係。所以，雖然在嘉慶年間，因為蔡牽多次侵擾鹿耳門的緣故而有重新建造？臺之議，但也就因為上述的緣故，最後僅能添造梭船三十隻加強海防而已。

（二）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以後的鹿耳門？臺

鹿耳門自荷鄭以來就號稱天險。這個天險又可分外險與內險。所謂外險是指船自外海來到此地要進海道時，不但波濤浩瀚不見口門，水底的沙汕橫互其下，船隻一經擱淺，立即破碎，而且港門深僅丈餘，航行期間，非先插標乘潮無法進出。至於內險，則是指通往臺江內海的海道內有出水沙線兩道，橫互南北；南線就是北線尾，為入郡咽喉，北線名海翁隙，其內可泊大船，水深浪湧，舟不能近，無法登陸，因為其險要之處在於海道之內，故稱為內險。

這個臺灣府城的天險海道歷經清初百多年之後，至遲到了嘉慶年間已有了不少的變化。據嘉慶十二年（一八一七年）謝金鑾纂修的《續修臺灣縣志》，已將鹿耳門港道南岸原稱北線尾的島嶼改稱為鹿耳門嶼，同時將北線尾這個名稱改成稱呼以前鹿耳門口北岸的沙汕了，此與乾隆以前以安平大港的北邊稱北汕，而南邊稱南汕已經不同。可見當時的島嶼、沙汕、港道等都有若干的變化了，不過做為郡城咽喉重地的地位則仍然沒有改變。⁽²⁸⁾

這樣的形勢，到了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因為七月的一場大風雨而有所改變，洪水挾帶內山大量的土石泥沙，淤塞了臺江內海。起先是「軍工廠一帶沙淤，廠中軍艦不能出入」，再經三個月之後，情況更為嚴重，原本可容千艘兵船的內海已變成了陸埔，真正是滄海變桑田。這兒就是我的家鄉——臺南市安南區。

據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姚瑩《東槎紀略》卷一 議建鹿耳門砲臺 引述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總兵觀喜、署道方傳樾、署府鄧傳安上議建鹿耳門？臺所記：

乃十月以後，北自嘉義之曾文、南至郡城之小北門外四十餘里，東

自洲仔尾海岸、西至鹿耳門內十五、六里，瀰漫浩瀚之區，忽已水涸沙高，變為陸埔，漸有民人搭蓋草寮，居然魚市。自埔上西望鹿耳門，不過咫尺。北線內深水二、三里，即係淺水，至埔約五、六里。現際春水潮大，水裁尺許，秋冬之後，可以撩衣而涉。自安平東望埔上魚市，如隔一溝。昔時郡內三郊商貨，皆用小船由內海驟運至鹿耳門，今則轉由安平大港外始能出入。目前如此，更數十年，繼長增高，恐鹿耳門即可登岸，無事更過安平。則向之所謂內險，已無所據依。北路空虛，殊為可慮！⁽²⁹⁾

雖然臺江內海海道變遷，鹿耳門內的形勢也已經變化。但上引三位官員仍為府城百年之計，建請於鹿耳門南線天后宮一帶建造新的？臺，並且圍以土堡，以堡衛兵，以兵衛堡，使巡防鹿耳門的兵有所依據，從而使鹿耳門仍可當做府城北路之要衝。可惜這個建議仍因鹿耳門一帶土質鬆軟不能建造？臺而沒有被接受。

道光三年之後的鹿耳門雖然逐漸被安平大港、四草湖、國賽港等取代了功能，但是，它與安平、府城西門外互為犄角，仍然是府城的一環，也是府城米糧財貨積聚的地方，且鹿耳門為淡水所在，向為眾船所汲取，當然在戰爭時也是敵人所覬覦的地方。因此，鴉片戰爭時，姚瑩為了防堵奸民接濟英軍水米、偷運鴉片，「委前署蘭廳閩令為總巡，持令會同水師所派左營千總梁鴻寶，督帶兵役，專駐鹿耳門內，防守策應，南北兩路，分頭巡緝。」⁽³⁰⁾

(三) 鹿耳門？臺的沒落與淘汰

臺江內海自道光三年的那場大風雨後，除因水涸沙高變為陸埔之外，鹿耳門港口也因經常河水泛濫致溪道紛亂，鹿耳門口終成今曾文溪的出海口，這個口門雖如前文所提的仍有若干的功能，但終因淤塞而使昔日的天險變成廢口。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一年）九月，姚瑩為防英軍侵臺，奏議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於府城條記：

鹿耳門距四草不及五里，在昔號稱天險，自道光三年淤塞，今口已廢，水深不過數尺，小船亦難出入。姑築？墩五座，設？四位，設？有警，即行堵塞。⁽³¹⁾

姚瑩不僅沒有考慮建造新的？臺，連？墩也以「姑築」的心態進行，並指示

在有警之時就將港口堵塞算了。

次年（一八四一年）九月，姚瑩另奏 臺灣不能堅壁清野狀 又記：

安平之北 過四草五里，則鹿耳門廢港，用石填塞。⁽³²⁾

可見在道光二十年或二十一年之際，鹿耳門淤塞的情況並無改善，其機能與地位也無法恢復，姚瑩終因鹿耳門久非商船之所出入，竟以塞之為是。⁽³³⁾

鹿耳門的發展，到了同治末年更被打狗所取代。據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丁紹儀撰《東瀛識略》卷五 海防 條記：

臺灣孤峙海東，非舟莫達。初止鹿耳門一口，沙堅如鐵，港道紆迴。樹標水中，以誌淺深，名曰盪纓。兩舟不能並駛；稍不慎，衝攔沙線，舟立碎。門內為安平鎮，設重兵扼守，夙稱天險。百餘年來，淤沙擁塞，安平至郡已可陸行。海舶到臺，多泊百里外之國賽港；另易小舟，盤運而進。昔險今阻，不同如是。海舶往來，遂不赴鹿耳，而趨打狗，桑田滄海，於此可徵。⁽³⁴⁾

鹿耳門終於難逃自然的淘汰而走入了歷史，清末的三十年也未見再設？臺或其他海防設施。

參、四草？臺建置始末

一、四草的歷史沿革

清代臺灣府城西側隔著臺江的安平，其外海之南北原有一線沙汕連環拱抱而成此一臺江內海；這條沙汕的中央有一道缺口，即安平大港，俗稱安平口，荷據時期，巨舟都從此入泊于臺江。這一缺口又將沙汕分成南、北兩汕，南汕以安平（即一鯤身）為起點，向南延伸共有七個島嶼；北汕則以四草為首，向北延展經鹿耳門至海翁汕。南北汕參差斜對，西瀕外海，東護臺江內海，是府城之關鎖，海防之要衝，其形勝之重要，已在前文敘述。

可是，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七月的一場大風雨後，海沙驟長，海道變遷，浩瀚臺江變為陸埔，鹿耳門形勢大異，不但安平與府承接壤，原來的臺江也形成了四草與鯤身南北兩個湖；四草湖海口與安平斜隔大港，其外水勢寬深，臺灣大商船自內地來者都

停泊在此。

自道光以迄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發生，四草湖不僅是府城重要口門，更具拱衛府城之要地。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四年）中英鴉片戰爭發生，波及臺灣，臺灣道姚瑩為了防止英軍入侵，奏建四草？臺於四草湖的北岸，與南側安平、二鯤身？臺互為犄角以衛臺灣府城與安平大港，可見其重要性，同時，也印證了過去二百年拱衛府城安危的鹿耳門及其？臺已轉移到四草湖及其？臺。

「四草」是指今臺南市安南區四草里。這裡有一座「四草？臺」位在四草里鎮海國民小學之內，是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四年）臺灣道姚瑩所建，用以取代已沒落的鹿耳門？臺。

「四草」里名的由來，據臺南市政府編印的《臺南市區里簡介》安南區云：本里古稱北線尾，其港稱北港。自鄭成功登陸後，始陸續有移居，當時有人發現山丘上有四株奇異的樹，析斷莖中間是賜福的草，性質類似保麗隆，因而稱之為四草。⁽³⁵⁾

是否真有四株奇特的樹已難考據，而最早出現「四草」這個名稱的文獻是清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魯鼎梅主修、王必昌總纂的《重修臺灣縣志》卷二 山水志 所記：

北線尾嶼，在鹿耳門之南，壤接鹿耳門。其西南有四草嶼，東南即安平鎮大港。⁽³⁶⁾

顯然當時的四草是一個島嶼，位在北線尾的西南方，與安平共扼大港。

《重修臺灣縣志》雖有提及「四草嶼」，然而所附的 臺灣縣全圖 中，並未繪出四草嶼的圖形或標示。但是，雍正初年撰的《清初海疆圖說》的 臺灣圖說 中，在安平鎮之北，北線尾嶼之間，有一個無名小島位在大港與小港之中，這個小島是否就是「四草嶼」，就很值得注意了。到了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蔣元樞在《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中的 修築安平石岸圖說 就清清楚楚地標示「四草」，並繪有草叢或樹叢之類的植物，應該有它的用意。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一 山水 條記：

鹿耳門嶼：在邑西北三十里大海中，浮沙橫互，形如鹿耳尾，迤南為四草嶼，首枕北為鹿耳門。⁽³⁷⁾

祇記方位，未見什麼變化，在海防軍事上也未見鹿耳門有何重要性的敘述。

四草的發展與臺江的變化密不可分。臺江自雍正初年至道光三年的一百年間日漸淤積，曾文溪、鹽水溪等新河系出現，河道又因山洪而經改道，排沙淤積形成陸埔及許多鹹水湖；新形成的鹽水溪流注於臺江未被淤填的部分，於是形成四草內海與安平斜隔大港。臺江淤塞、鹿耳門沒落的同時，安平大港口的淤沙反而逐漸流開，恢復成為府城對外交通的要口；而與安平對峙的四草，則成為共同防守大港口門的要地。姚瑩上 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 即云：

四草海口。四草與安平斜隔大港，即北汕之首也。其外水勢寬深，臺灣大商船自內地來，皆停泊於此。俗名四草湖。⁽³⁸⁾

可見，到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一年）四草已經從無甚緊要的小島，變成扼守安平大港口北岸的軍事要地。

二、四草？臺的創建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一年）清廷為了防堵英軍，調派鄧廷楨為閩浙總督，全力部署防務。鄧氏於七月初八日（丙申）奏稱：

至閩洋緊要之區，以廈門、臺灣為最；而臺灣尤為該夷歆羨之地，不可不大為之防。⁽³⁹⁾

同年九月，臺灣道姚瑩於完成臺灣南北路海口的會勘及查核後，上呈 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指出臺灣最要及次要海口十七處：

安平大港口、四草海口、鹿耳門、郭賚港、二鯤身、打鼓港及東港、香山港、竹塹、滬尾、大雞籠、蘇澳。⁽⁴⁰⁾

四草？臺就建造於四草海口。姚瑩並於狀中說明四草海口的特性：

四草海口。四草與安平斜隔大港，即北汕之首也。其外水勢寬深，臺灣大商船自內地來，皆停泊於此。俗名四草湖。遙望安平，約十里。⁽⁴¹⁾

由於四草海水勢寬深，與安平共扼大港，姚瑩因而特別指出郡城三處要口之一：

統計現在勘辦臺灣郡城要口三處，曰安平大港、曰四草、曰國賽港。⁽⁴²⁾

而從前統稱「天險」的鹿耳門，則「自道光三年來，已成淤廢，商船不能出入。」⁽⁴³⁾故淪為次要，這就是？臺建造於四草的主要原因。

四草？臺自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一年）初創至同治十三年（一八七一年）僅三十年的歷史，但細究其？臺的結構，實可分為？墩式的？臺與石造式的？臺兩種不同的形式

與階段。

(一)? 墩式的? 臺

四草? 墩式的? 臺是因為鴉片戰爭的需要建造的。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一年)六月,英船首次侵犯鹿耳門口,姚瑩立刻向閩浙總督請造大號戰船,七月,又上防夷急務狀,條陳防夷急辦的事項。同時他也了解英軍船堅? 利,攻擊設備未齊之下,勢難戰勝於海上,因此主張「目下要務,自當保固藩籬,守定而後議戰」⁽⁴⁴⁾,並上呈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說明四草? 臺的規模與佈置的方式:

四草海口 俗名四草湖。遙望安平,約十里,築? 墩十座,連長三十丈,設一千五百斤? 二位、一千斤? 三位、八百斤? 二位,墩外挖濠溝,寬一丈二尺、深一丈、長四十丈,濠溝內布竹籬二萬枝,外備釘桶八百箇、釘板八百塊、鐵蒺藜二萬枚,臨時應用。派外委楊金標帶目兵八十九名,文員興隆巡檢李清淮帶鄉勇二百名守之。⁽⁴⁵⁾

這是當時姚瑩在四草所設計的? 墩,但姚瑩在同一的「圖說」中對於? 墩的建造方法則有些差異。姚瑩稱:

至所築? 墩,仿照憲臺奏明? 袋貯沙之法,更以竹籬貯沙為之,稍為耐久。其上仍用? 袋為垛口,高一丈、厚一丈,長自十丈至三、五十丈不等。惟於? 墩外,加樹大羸竹筒,長一丈五尺,埋地五尺,其上一丈,竹節打通,中灌以水,編連排插重重,以為外護。夷? 雖猛,穿沙較難,見水亦可減力矣。更令多備牛皮、網紗、棉被,隨時以避鎗?。又於? 臺、? 墩要隘,挖寬一丈二尺、深一丈濠溝百數十丈,製備釘簞、竹板、鈎鑷、鎗棍六千四百餘件,鐵蒺藜十萬三千餘箇,竹籬十三萬二千餘枝,以備夷人登岸之用。⁽⁴⁶⁾

比較之下,可見四草? 臺的? 墩在設計上是簡單了不少。

這座在「急務」下完成的? 臺,創建於何時? 據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正月初四日姚瑩所稟的臺灣防夷經費請作正支銷狀云:

自九月初一日起,各口一律防堵,至年底止,鄉勇屯丁陸續減撤,時經四月,地盡全臺。⁽⁴⁷⁾

故四草? 臺應於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以前完成。

（二）石造的？臺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八月英艦攻擊雞籠？臺，雙方激戰後，雖然擊沉英艦，但二沙灣？臺的兵房也被毀，因此，為了加強臺灣的海防以禦英軍的？擊，姚瑩乃「在滬尾添設石？臺一座，雞籠？臺改築石？臺，臺左右添築石牆。」⁽⁴⁸⁾這種較堅固的石造？臺也用到了四草？臺。姚瑩 臺灣不能堅壁清野狀 中云：

安平之北，隔港六里為四草，亦砌築石填夾牆七十餘丈，內設兵勇位，以防敵人佔據。⁽⁴⁹⁾

顯然四草？臺已從急務下創建的？墩形式，改進為較堅固而永久性的？臺，同時也加大了？臺的規模。這座較堅固的石造？臺，到了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二月，姚瑩又再添加若干的設備，強化了？臺的威力。《東瀛奏稿》卷之三 遵旨籌議覆奏（夾片）云：

四草與安平大港對峙，安平為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港內復製大木排四座，上架大？攔截港門，更製二丈長大木鑽數百枝，上安大鍍鑽帶鉤，貫以籐條，橫浮水上，以罣其船。⁽⁵⁰⁾

三、四草？臺的廢棄

四草？臺建成後，與安平的「紅毛城？臺、大港？臺、天后宮？臺、安海頭？臺、灰？尾？臺」⁽⁵¹⁾互為犄角，共扼安平大港，同時也與鹿耳門、國賽港、二鯤身諸？臺形成臺海府城西方的海防障地。但自從臺江內海浮覆成陸埔後，新生地的發展仍未停止，且道光七年（一八二三年）臺灣道孔昭虔又出示招墾，更加速了此地的淤塞。

到了同治年間，國賽港至鹿耳門、四草湖間的航運需另換小舟或開鑿運河行以竹筏。⁽⁵²⁾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丁紹儀撰《東瀛識略》卷五 海防 條云：

臺灣孤峙海東，非舟莫達。初止鹿耳門一口，沙堅如鐵，港道紆迴。門內為安平鎮，設重兵扼守，夙稱天險。百餘年來，淤沙擁塞，安平至郡已可陸行。⁽⁵³⁾

可見，安平、臺南之間原有的內海已完全淤填，兩地之間已形成一條公路供通行。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唐贊袞撰《臺陽見聞錄》安平修路 條云：

安平公路，不測風潮，倘不隨時修補，須費浩繁。公議：每年小修一次。⁽⁵⁴⁾

顯然安平公路已經成為安平與府城間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是時四草湖已失去海防重

鎮的功能與地位。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二月，胡傳奉臺灣巡撫邵友濂之命，以全臺營務總巡的身分查閱全臺營務，包括安平、鳳山、恆春、臺東、花蓮、新竹、臺北、滬尾、基隆、澎湖、蘇澳等地，計三十一營、二十八哨。他將巡查的經過撰成《臺灣稟啟存稿》三卷，其中 光緒十八年五月十六日申 條記：

除卑職前於四月初一日在安平城內、五月十一日在楠仔坑阿公店及此次在灣裡街查閱外，尚有前哨八隊一棚駐安平西二十五里之四草湖，距灣裡街六十里，未能繞路往閱，合併聲明。⁽⁵⁵⁾

以查閱全臺總巡的身分與任務，胡傳竟以「未能繞道」為由而不前往巡查，可見四草湖已今非昔比，故駐軍也僅祇一棚（按一棚十四人）而已。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五月，劉永福為了抗拒日軍，將「嘉義陳羅原紮之翊安三營，調駐四草湖」⁽⁵⁶⁾，這是四草湖最後一次的駐兵，隨著劉永福的內渡，四草湖的海防機能與價值也驟然消失，[?] 臺遂走入了歷史而告廢棄。

肆、小結

清初的臺灣海防著重在防制內亂與緝盜以求杜絕禍害，清廷之於海防乃在於加強此事始能制臺與治臺，特別是朱一貴事件後的雍乾年間，清廷在臺灣的整個西部口岸約建造了三十多座的海防[?] 臺，初始即以鹿耳門為府城最重要的門戶重鎮，於是有了各式的[?] 臺。但是，清廷並未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迨至鴉片戰爭爆發波及臺灣之際，英軍挾船堅炮利以壓境，臺灣的海防[?] 臺乃有了更新變化，海防工作上也被迫由防內亂變更為防外患。

同時，臺江內海也在這個時間有了急遽的變化。內海變陸埔，鹿耳門與府城之間的交通、重要性都改變了，稍南的四草取代了鹿耳門，府城的第一門戶稍為南移並與安平本島接近，四草與安平共扼進出府城的航道，[?] 臺位置的選擇，[?] 臺形制與規模等也都發生變化與演進。

海防[?] 臺的設置是用來扼制重地發揮咽喉鎖鑰的作用，[?] 臺位置的選擇與考量也與當代的整體海防觀念、海防需求以及地形地貌地質、港道的變化等息息相關，故臺南府城的興衰，可以從其海防[?] 臺的建置變遷始末看出端倪。

註釋：

- (1) 沈有容（1969）。記，《閩海贈言》卷之二。臺灣文獻叢刊第五十六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24。
- (2) 蔣毓英撰、陳碧笙校注（1958）。《臺灣府志》卷之二，敘山 臺灣縣山，頁 17。廈門大學出版社。
- (3) 見曹永和（1962）。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附圖版，收錄於《臺北文獻》第一期。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
- (4) 同上註書，附圖版。
- (5) 同上，附圖版。
- (6) 楊英（1958）。《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三二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186。
- (7) 阮旻錫（1958）。《海上見聞錄》卷二。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四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8) 見陳漢光、賴永祥（1965）。《北臺古輿圖集》，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按本圖原藏於清內府，現藏於國家圖書館，題為康熙初年墨繪臺灣軍備圖。後經《北臺古輿圖集》收錄，改稱為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係明鄭時期所繪唯一之現況地圖。
- (9) 同上註，頁 5。
- (10) 同上。
- (11) 同上。
- (12) 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1970）。《巴達維亞城日記》，一六三一年四月二日條記：「臺窩灣（安平）港口日漸淺狹，再稍前尚有十三呎，而今則發現最深不過十一呎。」。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頁 69。
- (13) 《臺灣府志》卷之二，敘山 臺灣縣山 北線尾 云：「在鹿耳門南，與鹿耳門接壤，其南即安平鎮也。雖安平鎮不及里許，中一港，名大港，紅毛時甚深，夾板船從此出入，今淺。」（蔣毓英撰、陳碧笙校注，1985：17）
- (14) 同上註，頁 116。

- (15) 同上註，卷之八，武衛 水師汛第 ，頁 100。
- (16) 高拱乾纂（1960）。封域志 山川（附海道），《臺灣府志》卷一。臺灣文獻叢刊第六十五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8。
- (17) 郁永河（1968）。《裨海紀遊》卷上。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718。
- (18) 同註 16，卷四，武備志 水陸營制，附墩臺 ，頁 111。
- (19) 郭汝瑰等編著（1991），《中國軍事史》，第六卷 兵壘 ，第四章 明、清時期的兵壘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頁 267。
- (20) 陳文達（1968）。武備志 ，營志 ，收錄於《臺灣縣志》卷之四。臺灣文獻叢刊第一 三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108 109。
- (21) 黃叔璥（1960）。赤崁筆談 ，收錄於《臺灣使槎錄》卷一。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516。
- (22) 同上註。
- (23) 謝金鑾（1962）。《續修臺灣縣志》卷四，軍志 軍官 「林亮」條。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24) 同註 21。
- (25) 劉良璧（1961）。兵志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四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317。
- (26) 同上，卷十二，公署 臺灣府 條，頁 338。
- (27) 同上，卷十，兵志 ，頁 322 323。另姚瑩（1957）。議建鹿耳門？臺，《東槎紀略》卷一。臺灣文獻叢刊第七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30 32。及王必昌（1961）。武衛志 汛塘 ，「鹿耳門汛」條，《重修臺灣縣志》卷八。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一三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250。
- (28) 同註 23，卷一，地志 山水 ，「鹿耳門嶼」條，頁 22。
- (29) 姚 瑩（1957）。議建鹿耳門？臺，《東槎紀略》卷一。臺灣文獻叢刊第七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31。
- (30) 姚 瑩（1960）。《中復堂選集》第一冊。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三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77。

- (31) 同上註，頁 103。
- (32) 同上註，頁 63。
- (33) 同上註，與王提督書（庚子八月），頁 129。
- (34) 丁紹儀（1957）。海防條，《東瀛識略》卷五。臺灣文獻叢刊第二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51。
- (35) 臺南市政府（1984 年 6 月）。《臺南市區里簡介》。台南：台南市政府。
- (36) 王必昌（1961）。山水志，《重修臺灣縣志》卷二。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一三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38。
- (37) 同註 23，頁 1。
- (38) 同註 30，頁 17。
- (39) 臺灣銀行研究室編（1964）。《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三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15。
- (40) 姚瑩（1960）。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庚子九月鎮道會稟），《東溟文後集》卷四。收錄於《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三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76 84。
- (41) 同上註。
- (42) 姚瑩（1960）會商臺灣夷務奏，《東溟奏稿》卷二，收錄於《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四九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30 31。
- (43) 同上註。
- (44) 同註 40，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頁 72。
- (45) 同上註，頁 77。
- (46) 同上註，頁 75 76。
- (47) 同註 40，臺灣防夷經費請作正支銷狀，頁 94。
- (48) 同註 42，雞籠破獲夷舟奏（夾片），頁 32 40。
- (49) 同註 42，雞籠破獲夷舟奏（夾片），頁 32 40。
- (50) 同註 42，卷三，遵旨籌議覆奏（夾片），頁 85。
- (51) 同註 40，頁 77。
- (52) 盧嘉興，《鹿耳門地理演變考》六，清末鹿耳門及附近變遷情形。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頁 101 103。

- (53) 丁紹儀 (1957) 。《東瀛識略》卷五，海防 條。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一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51。
- (54) 唐贊袞 (1958) 。《臺陽見聞錄》，安平修路 條。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十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7。
- (55) 胡 傳 (1969) 。《臺灣日記與稟啟》卷一 光緒十八年五月十六日申 。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頁 27。
- (56) 思痛子 (1959) 。《臺海思慟錄》。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十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頁 14 17。

參考文獻

- 丁紹儀 (1957) 。《東瀛識略》，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王必昌 (1961) 。《重修臺灣縣志》，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江樹生譯註 (2002) 。《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
- 阮旻錫 (1958) 。《海上見聞錄》，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沈有容 (1969) 。《閩海贈言》，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郁永河 (1968) 。《裨海紀遊》，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姚 瑩 (1960) 。《中復堂選集》，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姚 瑩 (1957) 。《東槎紀略》，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思痛子 (1959) 。《臺海思慟錄》，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 (1970) 。《巴達維亞城日記》。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
- 胡 傳 (1969) 。《臺灣日記與稟啟》，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陳文達 (1968) 。《臺灣縣志》，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印。

陳漢光、賴永祥（1965）。《北臺古輿圖集》，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

郭汝瑰（1991）。《中國軍事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曹永和（1962）。《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錄於《臺北文獻》第一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黃叔璥（1960）。《臺海使槎錄》，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楊英（1958）。《從征實錄》，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高拱乾纂（1960）。《臺灣府志》，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劉良璧（1961）。《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唐贊袞（1958）。《臺陽見聞錄》，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蔣毓英（1969）。《臺灣府志》，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蔣毓英撰、陳碧笙校注（1985）。《臺灣府志》。廈門大學出版社。

謝金鑾（1962）。《續修臺灣縣志》，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臺南市政府編（1984年6月）。《臺南市區里簡介》。台南：台南市政府。

臺灣銀行研究室編（1964）。《籌辦夷務始末選輯》，收錄於《臺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